

人类学经典译丛

# 魅力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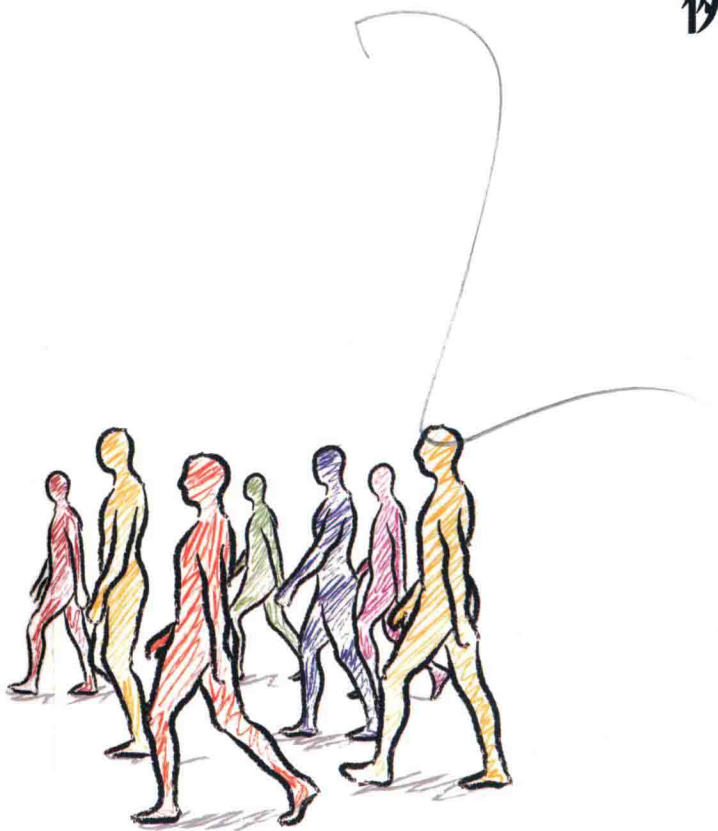
Engaging  
Anthropology:  
The Case for  
a Public Presence

## 吸引公众的书写案例

(挪威) 托马斯·H·埃里克森  
Thomas Hylland Erik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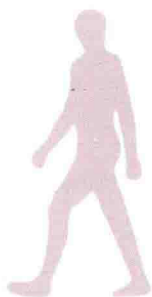
◎著

王卫平◎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人类学要么走向大众，要么因孤芳自赏而失去生命力。进入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人类学学者必须能够从容应对种种矛盾，在复杂关系中做出平衡和妥协，包括放弃单调的分析方法，重新学习并掌握叙述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要抛开顾虑，投入到当代世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事件中去，并有勇气直面可能遭遇的误解。埃里克森发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声音。

ISBN 978-7-5680-5926-8



9 787568 059268 >

定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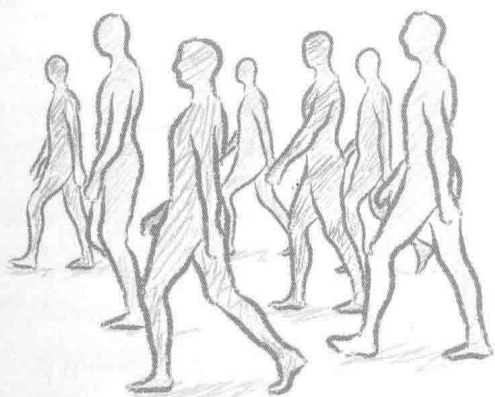
人类学经典译丛

# 魅力人类学

## 吸引公众的书写案例

(挪威) 托马斯·H·埃里克森  
Thomas Hylland Eriksen 著

王卫平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Thomas Hylland Erikse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7-2020-01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魅力人类学：吸引公众的书写案例 / (挪) 托马斯·H. 埃里克森著；王卫平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2

(人类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680-5926-8

I. ① 魅… II. ① 托… ② 王… III. ① 人类学-研究 IV. ① 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94442 号

魅力人类学：

吸引公众的书写案例

托马斯·H. 埃里克森  
(挪威)

Thomas Hylland Eriksen

著

Meili Renleixue: Xiyin Gongzhong de Shuxie Anli

王卫平 译

策划编辑：牧 心

责任编辑：张馨芳

封面设计：刘 婷

责任校对：阮 敏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美编室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1.75 插页：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



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 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作为当代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他继承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类学的宝贵传统, 活跃于公共领域, 致力于向大众宣扬人类学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 积极参与到涉及身份政治、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问题的公共事务和议题中。目前, 已有《小地方, 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全球化的关键概念》《什么是人类学》《时间, 快与慢》等多部作品被翻译引进国内, 受到广泛欢迎。

## 译者简介

---



王卫平, 文学博士, 约克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化学会会员,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讲教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汉英翻译、实用翻译、医学翻译等翻译课程教学, 从事翻译实践多年。在《外国文学》《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小说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翻译学和文学研究论文十多篇, 并出版翻译教材两部。

## 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学学者如何从茧式生活圈中走出来，通过写出吸引公众的作品，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为知识分子的影响作用。作者不仅要处理社会人类学的诸多议题，而且关注人类学作品与读者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如何将专业知识“翻译”为受大众青睐的作品？埃里克森不得不直面人类学知识固有的复杂性造成的困境，以及公众书写要面对的种种挑战。他通过丰富多样的案例，对在书写中如何处理复杂和明晰、细节和简化、叙事和分析、时空上的快和慢、一般性和本地性等诸多矛盾问题予以了反复的检视。本书不仅面向人类学学者，而且对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者也有借鉴意义。

- 策划编辑：牧 心
- 责任编辑：张馨芳
- 封面设计：刘 婷



超越传统出版 影响未来文化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 前言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学科，作为了解当代世界的工具，它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但在英语世界，我们很少在重要的公开辩论中听到人类学学者的声音。由此可见，人类学这一学科正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对其概念的普及也是一种挑战。

2004年初夏，文化杂志《展望》(Prospect)公布了英国前100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无一位人类学家上榜。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学者的普遍缺席——和新闻记者、散文家与评论家并列榜单的，不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缺席本应该引起这门学科的重视——毕竟，社会科学家在我们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关心这一类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人类学学者对于自身鲜有人关注这一现象并不太重视。毕竟，人类学，不管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已经很久没有活跃在公共视野中了。事实上，它在英语世界几乎已经潜入地下，正如阿多诺所言，“蛰伏于一种晦涩的语言中”。

这种情况令人费解。人类学研究的是有关人的本质，其中包括理解他人的世界，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目标，阐释他们的社会运作方式及他们为什么信仰所相信的一切——既包括低声窃语的怀疑，也包括振臂高呼的异议。人类学家对人类生活有着充分的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谙是什么使得我们与众不同，又是什么使我们相差无几。然而，这些专业人士



似乎不愿与广大读者分享他们的见解。将其他文化“翻译”到自己的文化中，是人类学家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如果是以外行的大众作为目标读者群体，似乎就显得不那么紧迫了。人类学专著和文章往往冗长且专业性强，坦白来说是枯燥无味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文章内容都专注于细节，对于宏观问题却抛之脑后。注重细节本身无可厚非，对于人类学的初涉者来说，掌握专业化知识和使用专业术语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人类学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没有分别了。

所有这些优秀的分析文本，往往充满了独特的见解和新颖的视角，问题是它们鲜能吸引普通读者的关注。此外，也少有人以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材料进一步撰写一些科普性的作品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这几年收集到的各种反馈信息带给我深深的挫败感，我感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我写这本书，旨在试图展示人类学如何影响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从25岁左右开始，我就一直潜心钻研人类学这一领域，我由衷地钦佩来自世界各地同行们对这一领域的密切关注及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显然，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让几乎所有潜在的读者望而却步。而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出版商的营销不足或普通大众的认知浅显。上一次读到令你爱不释手的人类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呢？我自认为读了很多有趣的人类学书籍，但也很难自信地回答这个问题。

青年学生在研究人类学这一领域时，往往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兴趣。通常他们的学习动机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虽然他们也会疲于应对人类学枯燥理论和抽象模型的冲击，但这不会转移他们对人类生活中各种重大问题的关注。人类学教师的任务是，确保他们的学生不会忘记学习人类学的初衷，保持他们的学习热情，促使他们砥砺前行。

本书是为那些有兴趣了解人类学领域的读者而作，既包括这一领域的从业者，也包括从未涉猎过这一领域的读者。这本书不可避免地针对当前人类学界对人类学知识的处理方式提出了批评，批评只是客观地针对学界体制而不是作者本人。幸运的是，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对如何改变这种体制已有所觉悟。

一开始，我考察了人类学作为西方文化界核心贡献者的角色——它过去是何种面貌，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紧接着我提出质疑，是什么导致了人类学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哪里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并

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随后，我详细地研究了人类学著作与读者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在这里，我冒昧地引用了几篇我自己为报刊撰写的文章作为例子。这些例子并非值得效仿的范例，而仅仅是能说明问题的案例。

在阅读之前，我要补充说明，本书并非一部宏大的作品，仅是一个适度的尝试。首先，本书涵盖的内容并不全面，所挑选出来供讨论的代表性作品通常或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或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多数情况下亦可以被其他例子替代。

其次，我不想贬低同事们在土著权利运动、发展工作、政策咨询、移民问题等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和知识影响力已不言而喻，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在以上及其他更多领域均是如此。然而，本书侧重的是人类学学者如何通过媒体处理那些对公众重要的问题，从而与读者一起来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话题，德国人称之为“Die Öffentlichkeit”，即“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

再次，本书侧重于英语人类学作品，书中使用了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反例来说明公共人类学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英语在当代人类学中有着不可挑战的霸权地位，英语的出版物、会议记录和阅读书目在世界人类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如今其他语言的写作也与英语书写亦步亦趋，这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大相径庭；彼时，非英语母语的人类学研究和写作自成一派。

21世纪初的几年中，我在做全球化与人类学这个主题的文献研究时，观察到一些令人失望的现象。在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中，西班牙语和德语出版物的地方风味比我预想的要少得多。他们大多讨论同样的英语理论和英语学者，默认外界强加给自己的边缘学者的身份。尽管如此，如果我这本用英语写作的小书能够将不同语言的书写都包括进来做一些比较研究，包括那些用南非荷兰语、法语或意大利语写作的作者及其作品，这本书将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为对于使用英语以外语言的某些人类学学者而言，接触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对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本书侧重于人类学家的作者身份，主要关注书写文本和书写形式，较少关注人类学学者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身份，也甚少涉及人类学学者作为摄影师或电影制片人的身份。

本书写于2004—2005年，但2003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开普敦大学、



罗德斯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人类学学院的研讨会上就该书的一些问题展开过讨论。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学者对我的邀请，并给我诸多灵感。第4章中间部分的早期版本于2003年发表在《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 Eriksen, 2003)上，这要归功于它的编辑古斯塔夫·豪特曼(Gustaaf Houtman)的倡议。

我还要感谢奥斯陆大学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朋友们。20多年以来，从少数民族问题到礼仪研究，从结构主义二元论到马克思主义正统论和后现代理论之辨，他们一直是我前行的旅伴和向导。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提醒我放慢脚步。恕我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但有一个名字我不能不提——我的老师爱德华多·阿凯蒂(Eduardo Archetti)，他也是我共事15年的同事。在这些年中，他带给了我无尽的启发和灵感，尤其是帮我认识到人类学为何如此重要。他时而戏谑热忱，时而理性严谨，寥寥数言难以描述他的独特魅力。我也非常感谢贝格出版社(Berg)的两位审读编辑，其中一位是基思·哈特(Kieth Hart)。他们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在认真研读我的作品之后，对初稿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我希望最后的定稿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最后，衷心感谢凯瑞(Kari)、欧乐(Ole)和阿曼达(Amanda)，是他们让我的业余生活也变得如此有价值。

(挪威) 托马斯·H. 埃里克森

2005年6月



# 目录

---

第一章	人类学走向大众的简史	— 001
第二章	出了什么问题	— 029
第三章	复杂性和语境	— 053
第四章	快媒体与慢媒体	— 085
第五章	叙事和分析	— 113
第六章	变换中心的 (altercentric) 写作	— 139
结语	人类学为什么重要	— 157
参考文献		— 161
译后记		— 179

---

# 第一章 人类学走向大众的简史

一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研究的优点，人类学家自鸣得意地说：“当你们历史学家想要研究一条河时，你们必须等到它干涸，然后才能带着放大镜和其他类似的工具下到干枯的河床去；而我们人类学家则不同，我们会直接跋涉到泥泞潮湿的河边，待在那里一遍遍地看河水流过，直到我们发现其中的奥秘。”历史学家听完，点上烟斗，看着窗外缓慢答道：“嗯，你说的有道理。但你们人类学家让汨汨的河水流干了，而我们是致力于将水再带回这片干涸之地。”历史学家所做的是讲故事，而人类学家则是将故事转化成分析。这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人类学家总是与大众脱节。



人类学本该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学科，但是其在学界之外的公共领域显得默默无闻。这一点无疑令人困惑，因为人类学家以原创的、权威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紧急议题，这些议题范围广泛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许多公开辩论，议题涉及多元文化主义、国族主义、人类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人权、贫困、经济全球化以及集体和个体身份认同等诸多领域，人类学家本应该站在论坛最前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全世界人类学家集体失声，无论是在公共媒体还是一般的学术界都很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除了少数研究发起者之外，普通大众对人类学家们采用的精巧的视角、繁复的分析和有趣的田野素材一无所知。事实上，每当人类学家们尝试以普通大众为对象来写作，他们或忸怩不安地对自我加以嘲讽，或刻意强调其以非人类学读者为写作对象实在是因为谈论的话题至为重要才不得已而为之。法国人类学家飞利浦·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的作品深受法国人类学擅长通俗写作的传统的影响，兼具文学和学术价值。一位出版人曾建议德斯寇拉为公众写一写黑瓦洛人（他曾与这些亚马孙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情况，德斯寇拉描述了自己写作时的复杂情感（Descola, 1996）。回顾写作《蒙昧之矛》（*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的过程，德斯寇拉承认他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驱动，想要向我的同仁们说明为‘普通大众’写作这样一部人类学作品的必要性”（1996：208）。他进一步认为，人类学家不情愿向公众发言的奇怪态度可能出自一种焦虑感，担心外界可能会发现那些为该学科提供支撑的“科学准则”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德斯寇拉认为，正是人类学家们对自身缺乏自信导致了人类学的作茧自缚。这一观点虽然有失公允，但也颇具可取之处，后文我们会详加讨论。现在需要对人类学与大众接触的历史进行简要的回顾。

## 第一节 人类学与大众接触的历史回顾

人类学面临的此种困境并非从来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学与公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立于1871年的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正是秉着致力于向大众传播科学的精神而建立的。而且在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人类学研究牢牢地扎根于博物馆，正是为了促进与公众的交流。这种情形一

直延续到 20 世纪的后半叶才发生了改变。在世界人类学中占主导的英语国家传统摒弃了与公众交流的做法，开始向内转，转向学科自身。这一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被公认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的几位大家，无论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E. B. 泰勒（E. B. Tylor）还是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他们并不打算做封闭圈子里的老学究，而是精力充沛地投入其时代的各种公共辩题中。摩尔根关于社会演化和亲属关系的研究影响深远，引起了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读者的兴趣。查尔斯·达尔文写作《人类起源》时，也从泰勒那里借鉴甚多。多卷本巨作《金枝》的作者弗雷泽，更是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英国知识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神话比较学巨著曾让 T. S. 埃略特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深受启发。在关注文化历史和人性这些大议题上，这些早期的人类学家们积极参与到广泛而丰富的公共知识空间，与博物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们站在一起，探讨如何去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此类人类学家群体大多为通才型人物，或为独立的绅士型学者，在“人类学”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训练可能略有不足。他们往往不为大学学科之间的制度所囿，致力于探索知识和未知。最后一代这样的人类学学者，包括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威廉·里弗斯（W. H. R. Rivers）及詹姆斯·弗雷泽本人。哈登出于对生物学的兴趣提出人类起源的理论，里弗斯则是开创性的文化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心理人类学默默无闻的创建者。

后来者可能会将这些早期的现代人类学家视为肤浅的涉猎者，或坐在靠椅上的思辨理论家，这种看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公允（Hart, 2003）。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继弗雷泽和里弗斯之后的一代人类学家的卓越代表。他于 1922 年提出，民族志（或人类学）终于得以能够“将自己的工作坊整治有饬，锻造出适宜的工具，为自身的使命做好准备”（Malinowski, 1984 [1922]: xv）。然而，也正是从他这一代开始，人类学开始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不断向内收缩边界，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其下一代，即二战之后的一代人类学，自我封闭的圈子形成了。

实际上，在是否愿意跨越学科疆界和与普通公众交流这个问题上，即



使是主张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马林诺夫斯基及其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与二战后的一代人类学家之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马林诺夫基本人为通俗杂志撰稿，同时也参与一系列的公开讲座，主题包括原始经济学和性等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被公认为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他也是其所处时代一个重要的反纳粹公开呼吁者，在媒体上及公共集会中都可以看到他活跃的身影。而他的对手们认为种族是导致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这一群体在 20 世纪早期人数众多且手握权力。在法国和德国，情形也类似，人类学家们深度参与到他们所处时代的重要议题中，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发言，而不只是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中的一员。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人类学家的专业意识增强，进一步磨砺了理论工具，田野方法变得更为纯粹。尽管如此，即使如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和美国的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这些大家在写作时也会将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一并考虑进来。

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多年间，人类学涉及了更广泛的领域，并且成就非凡。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1934）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挑战了多种对于文化的先入之见，同时在人类学内部建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这位师承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的女性人类学学者才成为 20 世纪最富盛名和作品最为畅销的作者。

米德的处女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 1928）出版之时，借鉴了文化相对主义，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兴起，并令人信服地以一种激动人心的途径和方法来研究人类多样性，为如何理解多种可能世界提供了新鲜的视野和可能激起争论的真见。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Marcus & Fischer, 1986）强调的那样，米德的书通过展示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有可能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强有力地展示了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批判功能。

米德的时代是文化相对主义的黄金时期。博厄斯以长辈般的谆谆口吻为其门生的处女作写下序言，他满怀信心地将这部作品看作受益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杰出范例。作品既是文化的变形镜，也是令人激动的新知识来源，最终能对人类状况做出最为深入的勘探。

礼貌、谦恭、举止得体和符合明确的伦理标准被认为是普适的。但是，构成礼貌、谦恭、举止得体和伦理标准的内容并不是普适的。这些标准常常会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变异，明白这一点具有启发意义。而个体如何对标准做出反应则更为重要。（Boas in Mead 1977 [1928]: 6）

米德的著作在人类学学科内部并不被视为经典之作，反而备受争议。批评她的人认为她对民族志的涉猎过于肤浅，且频于做出笼统的推论，或者没有与研究对象保持足够的距离而显得不够专业。此外，她略浅显的文字和过于感性化的散文风格也有损专业性。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51: 96）用“闲聊的女性体”来形容她的风格，“我将之称为风沙沙地吹过棕榈树叶式的人类学写作，这种风尚正是始于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评价近乎有些女性歧视的嫌疑。至少在欧洲，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的作品往往被列入了人类学专业的阅读书目，而米德的作品却甚少被学生阅读。

实际上，米德流畅的散文风格引起的不同反应，为之后的通俗人类学写作得到接受和认可设立了标准。一般而言，在广泛读者群中大受欢迎的人类学文本，却很难在学科内获得认可。

对通俗写作持这种怀疑态度的理由，可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为了更干脆利落、更清晰地向她的美国中产阶级读者展现“异域文化”形象，米德在做出笼统推论时很少犹豫。这一点至少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她将自己的文化漫画化；二是她将“他者”简化为裁剪的硬纸板形象；三是她常常仅从对少数个体故事的分析直接得出关于整体文化特质的结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米德既通俗又不失专业的作品给广大的西方中产阶级黑白分明的世界添加了一点复杂性，让世界变得更开明、更美好。为米德辩护的人认为，应该让那些学术界的学者去阐释人类学的种种精确和更细微之处，而将主要观念和视野的传播工作交给更擅长的人。有一个显著的例子，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根据出版商的建议补充了一章，将波利尼西亚人与美国人进行比较（di Leonardo, 1998），显然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

米德初期的几部作品成稿之时，文化相对论正成为理解人类处境的新视角，这一视角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尽管文化相对主义的胚芽被认为孕育